

天津社会科学丛刊第五辑

黎干经济论文选

天津社会科学丛刊编辑部出版

说 明

黎干同志是天津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天津市社联常务委员。黎干同志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宣传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从我国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出发，深感城市经济问题和经济效益理论问题亟待研究，于是带领几位研究人员，积极开展了有关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遗憾的是在研究工作刚刚深入进去的时候，他竟匆匆地突然地离开了我们，于1985年12月15日赶写论文时，突然发病，不幸以身殉职。为了寄托我们的哀思，缅怀黎干同志，我们收集了他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共计13篇，编成这本《黎干经济论文选》，以飨读者。

天津社会科学院

1986年6月

目 录

进一步肃清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的影响·····	(1)
经济体制改革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8)
有关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意见·····	(22)
城市经济学研究述评·····	(34)
城市现代化应该成为城市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41)
城市与生产力	
——试论城市在我国现代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	(48)
城市的国民经济本质与城市改革·····	(57)
沿海城市在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作用·····	(67)
京津地区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与经济区建设·····	(80)
天津市在我国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90)
有关经济效益理论问题的初步探讨·····	(97)
马克思经济学说与经济效益理论·····	(121)
按劳分配与社会主义经济效益·····	(134)

进一步肃清经济建设中 “左”的错误的影响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从今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的认真的调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次调整，对于我国今后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它不仅要解决当前的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的问题，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是通过这次调整，要把我国国民经济从过去“左”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解放出来，使经济工作有个大的转变，转到真正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根据过去两年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的经验，搞好这次调整必须从思想上进一步肃清“左”的错误的影响。

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过去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主要错误是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这是建国以来，主要是一九五八年以后，我们在经济上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这是对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

建国三十一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总的说走的是一条曲折的道路。它不仅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进程，而且在经济上至今仍然使我们遭受它所造成的困难的惩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们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

想上脱离了我国的客观实际，犯了“左”的盲目冒进的错误。

三十一年来，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总的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即：要求急，规模大，指标高，步子快。简单地说就是过急、过大、过高、过快。所谓“过”，就是超过了我国的客观实际和可能，犯了盲目冒进的错误。从主观原因上说，就是要求过急。要求过急在所有制上表现为急于过渡，在经济建设上表现为急于求成。由于要求急，因此在行动上产生了盲目冒进。所以，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盲目冒进，其实质则是指导思想超过了客观的实际和可能。

在民主革命时期，针对当时的左倾冒险主义，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曾经作过如下分析：“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实现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我们在经济建设中所犯的错误恰恰就是过去毛泽东同志曾经批判过的那种性质的错误。

多年来，我们在经济建设工作中把幻想当作真理，或者把仅仅在将来有实现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就所有制方面来说，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对所有制的改造一直采取典型示范、由低到高、逐步前进的办法，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批判了“小脚女人”，一九五六年就来了个冒进，几亿人口的农村一下子实现了全面高级合作化。如果说这个问题当时主要还是在改造的步子上走得过急、过快，到了一九五八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性质就完全变了，就已经不仅仅是过急、过快的问题，而成为对新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破坏。当时总的指导思想是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所以提出“一大二公”，组织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好，因

此大刮“共产风”，妄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美妙的共产主义天堂。由于把幻想当真理，结果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这个问题后来虽然经过多次纠正，但是在思想上并没有根本解决。以至情况稍有好转，同样的问题又重新出现，在农村多次地并队并社，在城市多次把集体升到全民。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四人帮”仍在利用这个问题搞篡党夺权，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在经济建设方面，盲目冒进也是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当时主要是在基本建设上搞得大了些，因此在经济上出现一些紧张情况，但当中央负责同志提出批评以后，很快就解决了。可是，到了一九五八年，又把当时对这种错误的正确批评当作右倾拿来批判，结果就来了一次大冒进。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实际上是大冒进。当时错误地认为我国不仅可以用“穷过渡”的办法一下子进入共产主义，而且在生产上靠着小土群很快可以赶上甚至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于是浮夸风、高指标都来了，什么超英赶美，放卫星，钢铁翻番，粮食翻番，全民炼钢等等，都提出来了。由于缺乏建设经验，脱离了客观的现实性，结果，大跃进变成了大跃退，带来了连续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在大跃进失败以后，这种“左”的错误不仅没有受到批判，反而在一九五九年来了个反右倾，三年调整刚一结束，一九六六年起又来了个十年“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我们没有认识到我国似大病初愈的状况，继续犯了一些冒进的错误。所以，三十一年来，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不少瞎折腾，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长期得不到稳定健康地发展，在经济上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这是我国多年来经济一直搞不上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次次地搞冒进，归根到底是由于我们在经济建设总的要求上过急、过大、过高、过快。由于要求急，超过了客观实际的可

能性，不仅造成经济上一次次地踉跄折腾，而且在各方面造成了紧张。由于急于把建设搞上去，一方面把建设的规模搞得很大，结果超过了我国国力和人民群众所能担负的程度，于是便拚命提高积累率，压低人民的消费水平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开支；另一方面，由于急，把指标订得很高，超过了客观可能达到的水平，所以就拚命追求速度。速度越来越高，步子越来越大。结果只求多快，不求好省，造成投资多，效果差。这样，国家每年挤出大批的钱去搞经济建设，又长期从中得不到经济效益，就造成各方面的紧张情况，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这是“左”的指导思想造成的严重危害。

“左”的错误造成的危害除了表现为一次次地搞冒进和总的要求上过急、过大、过高、过快，造成了经济发展的极不稳定，还使经济建设本身脱离了正确的轨道。由于经济建设搞得过急，一切服从经济建设，一切为经济建设让路，结果使经济建设本身脱离了当前社会的需要，这样就成了为建设而建设、为生产而生产，造成了经济结构上的极不合理和各种重大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

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我国多年来经济建设上所走的道路，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重速度，轻效率**。三十一年来，我国工业发展速度平均每年达到百分之十几，这在世界上也是很高的。但是人民群众却没有感到从这种增长中得到明显的好处，原因之一就是经济效益太差。据统计，天津市全市工业固定资产一九七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七倍多，而工业总产值和上缴国家的税收和利润总额仅仅增加了三倍多。

第二，**重基建，轻生产**。由于把扩大生产规模（即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作为扩大再生产的主要手段，因此，每年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搞基本建设，而对于提高原有企业的生产能

力（即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却很少注意。由于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基金大部分被拿去搞基本建设，影响了原有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因而使许多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长期得不到提高。

第三，**重积累，轻消费**。一九五八年以来，大部分时间每年的积累率在百分之三十以上，有的年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大大超过了许多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使人民生活水平不仅多年没有提高，甚至有所下降，社会欠账越来越多。

第四，**重重工业，轻农业和轻工业**。由于片面理解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道路，重工业比例越搞越大，挤了农业和轻工业。据统计，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八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重工业占百分之五十五以上，而农业和轻工业二者相加仅占百分之十五多一点。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八年国家冶金工业一个部门的基建投资即为整个轻工业投资的一倍多。

第五，**重加工工业，轻基础工业**。三十年来，加工工业摊子搞得很大，而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工业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造成能源紧张，原材料供应不足，使许多工厂生产能力得不到有效的发挥。

第六，**重生产，轻流通**。生产和流通严重脱节，许多产品生产出来销不出去，造成产品和资金的积压，流通渠道越来越窄，流通手段严重不足，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

这“几重、几轻”，反映了我们的经济建设脱离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性，走上了单纯为建设而建设的错误轨道。加上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就造成了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和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的情况。

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损害是十分严重的，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这种错误没有认识，不仅不能及时纠正，而且越来越严重。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

能总结经验。粉碎“四人帮”以后，也没有能够及时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到了三中全会以后，才有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并开始从各方面纠正“左”的错误，接着在经济上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使经济工作开始摆脱过去“左”的错误的束缚。两年来，在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和八字方针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左”的错误影响没有肃清，在执行中也遇到很大的阻力，特别是在调整问题上，碰到很大困难，基本建设的规模压不下去，甚至还有增加的趋势，给财政上造成很大的压力，经济中潜伏着很大的危险。事实说明，如果不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左”的错误的的影响，不仅当前调整经济的任务不可能顺利地进行，而且还有重犯过去错误的可能。

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归根到底是由于指导思想脱离了我国的国情，没有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因此，肃清“左”的思想影响，首先要对我国的国情有个正确的认识。陈云同志指出：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其他国家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很多。这就是说，认识我国的国情，首先就要认识十亿人口、八亿农民这个国情。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离开这个基本国情，它既是我们经济建设的出发点，又是我们经济建设的归宿，既要考虑它对经济提出的要求，又必须受着它的制约。说它是出发点和归宿，就是说我们进行经济建设归根到底是为十亿人口、八亿农民服务的。考虑他们的要求，就是要考虑他们吃饭、穿衣、住房、就业、上学等问题。在解决了他们的这些要求之后，国家能够拿出来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就不多了。因此，不能把经济建设的规模搞得很大，只能量力而行，在经济结构上要多发展点农业和轻工业，这就是他们对经济建设的制约，这就是从我国的基本国情

出发。

肃清“左”的思想影响，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从本本或者什么抽象的原则出发，这是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因此，我们不论做任何工作，一方面一定要考虑实际的可能，贯彻上级指示一定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要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发挥主观能动性，一定要和客观规律性结合起来，不能只讲主观能动性，不讲客观规律性。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随心所欲，实际上是一种盲目性，最后必然会在实践中遭到失败。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必须克服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过去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所以犯“左”的错误是和我们思想上存在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分不开的。一九五八年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典型的唯心主义。粉碎“四人帮”以后盲目提出的高指标，也是主观主义的反映。形而上学的主要特点之一是片面性，片面性就不能全面地反映客观实际，因此，也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

总之，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在过去，由于“左”的错误指导，也由于缺乏经验，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标志着我党决心同“左”的错误决裂。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肃清“左”的思想影响，进一步认真地把这次调整工作搞好，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此文发表于《天津日报》1981年3月24日）

经济体制改革与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受着外国模式的影响，脱离了我国的国情，给经济建设带来了不利影响。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改革现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建立起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能够真正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没有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四个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实现。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要适合各个国家的国情，要具有每个国家的特色，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各个国家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体现。社会主义和历史任何社会经济制度一样，除了必须共同具有的一些基本经济特征，在各个国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它总是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情况和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而采取不同的形式。从各个国家不同的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形式和特点，建立适合自己国家国情的、具有每个国家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各国共产党人的一项基本任务。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有着十亿人口的大国，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较落后，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解放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自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在这样一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无论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和原来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比较，都具有很大的特点。如何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更好地运用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建立起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建国以来我国所形成的一套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五十年代初期在苏联模式影响下建立起来的。这套经济体制，总的说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要求，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表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这种体制，一方面把我国原来分散落后的、小生产占主要地位的、基本上是地区性的经济，组织成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全国性的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能够集中一定的力量和资金，进行全国性的重点建设，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80年同1952年相比，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八点一倍，国民收入增长四点二倍，工业固定资产增长二十六倍，说明这种体制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存在的问题来看，这种经济体制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不能很好地适应我

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这种经济体制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第一，从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的组织形式上来说过于单一，基本上就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经济形式，而每一种经济形式本身又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式；第二，权力过于集中，除了必要的必须由国家统一掌握的涉及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许多属于经济日常活动的具体问题也统统由国家统一掌握；第三，在计划经济的管理方法上过于简单，主要是依靠行政组织和行政办法来进行管理，缺乏必要的经济机制和经济手段；第四，国家对经济组织的领导，主要是通过两条渠道，一条是通过中央的各个经济部门，一条是通过各级地方政府，从而使企业分别隶属于一定的部门或地区，形成条块分割的管理体系。从三十年来的实践结果看，这种经济体制有很大的弊病：一是很容易产生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现象，不利于调动每个劳动者的积极性；二是不能充分发挥企业的作用，使企业在发展生产和改善经营管理上缺乏必要的动力和活力；三是机构重叠、互相牵制，经济效率不高；四是条块分割，阻碍了地区、部门、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自然联系，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五是缺乏必要的经济机制，出了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我国多年来经济工作中出现的许多失误，从根本上说固然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但另一方面不能说和这种经济体制没有一定的关系。这种体制，由于在许多方面超出了我国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情况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我国农业现在总的说还处在比较落后的阶段，人多地少，农业人口占全国的百分之八十，现代的生产工具很少，大部分靠手工劳动，劳动生产率很低，生产发展主要依靠劳动者个人积极性的发挥，利用传统农业技术，进行精耕细作；农村中商品经济很不发达，自给半自给的成分占有很大比重，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

作，加上国家大，自然条件复杂，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全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把几亿农民按一个模式组织起来，在生产上由上级领导机关层层下达指示，发号施令，不仅严重地限制了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为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共产风等等提供了可能的条件，造成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严重对立，给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我国经济体制上的这种缺陷，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它所依据的苏联模式，本身就是一个不成熟的模式。苏联的这种经济体制，是在它处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反映了当时苏联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水平。我们知道，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有关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例如，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究竟仅仅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究竟还存在不存在商品生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不能代替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等等，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当时的主导思想是要尽快地过渡到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一套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后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特别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发展的需要。其次，这种体制在五十年代初期被引进到我国，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还处于刚刚开始阶段，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缺乏必要的认识；另一方面除了苏联以外，当时也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提供这方面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把苏联当作社会主义唯一的样板；加上当时民主革命刚刚胜利，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以及其它各种有利条件，使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都取得了较大的胜利，因此，当时不可能考虑到这种体制是不是适合我国国情的问題。1956年毛泽东同志和

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开始察觉到我国在经济建设中存在着照抄照搬苏联的错误，并且在《论十大关系》报告和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对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方针。但是后来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左”的错误，这些正确的方针没有能够得到贯彻，1958年大跃进和十年内乱，虽然表面上是要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实际上是在错误的方向上更加发展了这种模式的缺陷。

我国当前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针对上述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对社会主义的具体经济形式和经济管理制度进行的一次伟大的变革。通过这种改革，使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一方面更加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更加符合我国的国情，把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好地结合起来。

什么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同志1979年3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指出，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看到我国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个是我国的底子薄，我国现在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再一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这就是我国最基本的国情。这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具体特点和要求。首先，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在我国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是经济发达国家和其他比较小的国家所没有的。能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第二，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我国的一个大问题，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这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我们的基本原则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解决好这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第三，经济效益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只有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需要，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才能使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向

前发展。但在我国条件下，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很低，经济效益不高，如何提高整个经济工作的经济效益，是我国经济建设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一切经济工作的核心。第四，在我国商品生产需要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商品生产不发达是我国经济落后的主要标志，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生产的大部分产品仍然是属于农民自给自足的性质，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社会生产就不可能得到很大的发展。不仅如此，城市和工业的生产，在社会主义阶段也仍然属于商品生产的性质，也需要按照商品的要求组织生产和交换。第五，克服平均主义在我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国原来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平均主义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而且表现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严重地影响着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危害极大。邓小平同志1980年在和外国记者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因此，克服平均主义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这些特点和要求，需要一定的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来加以保证。我国过去对经济体制曾经进行过多次的改革，但由于总的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改来改去没有跳出原来的框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1979年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后，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同时，积极开展了对经济体制等问题的研究和试点工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我国广大农民发挥了空前的创造性，以包产到户、包工到户为突破口，冲破了多年来束缚我国农民手脚的一套旧的经济体制框框，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

次伟大变革，是我国农民震动世界的伟大创举，正如陈云同志所指出的，其意义不下于三大改造。这一次改革不仅开创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新局面，而且推动了其他战线的改革，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之从多年来的老框框中解放出来，为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根据几年来各条战线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经验，特别是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的经验，根据党的十二大所确定的方针，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在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组织形式上，在以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实行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济形式并存。重要经济命脉由国家直接掌握，在工、矿、交通等部门和城市经济中，国营经济是主要经济形式；在农村，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是主要经济形式。此外在城镇要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在城市和农村，要允许个体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同时，根据对外开放政策和引进外资的需要，还要允许外资和中外合资企业的存在。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本身，也要采取多种经营方法和组织形式，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坚持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从根本上说是由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状况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又是极不平衡的。不仅在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就是在同一行业、同一地区内部各个企业之间也是参差不齐、各不相同的。有些行业、部门技术水平现代化程度比较高，有些行业、部门技术水平还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有的甚至完全靠手工操作，从而使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呈现为多层次的和不平衡的状态。这种情况决定了我国现阶段在生产